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2~20

2012年12月27日

蘇聯演變 20 週年有關爭論的隨想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周新城

—

如果以蘇聯解體為標誌，¹ 2011 年是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 20 週年。在這一年裡，我國學術界掀起了研究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的熱潮。出現了一系列著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兩本論文集，一本是李慎明主編的《歷史在這裡沉思》，一本是陸南泉主編的《蘇聯真相》，兩本書都聚集了一批專家，然而這兩本書在許多

¹ 蘇聯解體與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性質不同的、然而密切相聯繫的兩件事情。蘇聯解體是國家形式的變化，由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變為 15 個獨立的國家，而蘇聯演變則是社會制度性質的變化，由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但如果蘇聯不向資本主義演變，堅持統一的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蘇聯是不可能解體的。演變是因，解體是果。演變是一個過程，人們往往把蘇聯解體看作是蘇聯演變的標誌。

原則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截然相反，大體上可以代表國內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開始的時候，我還有點納悶：蘇聯問題終究是外國的事情，而且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 20 年，成了歷史了，也許少數專門研究蘇聯歷史的人會對此有興趣，怎麼會在相當大範圍內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並引發那麼熱烈的討論呢？隨著討論的深入，慢慢我明白了：這是因為關於蘇聯演變原因和教訓的研究，直接關係到中國應該怎樣評價自己的歷史，今後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終究我們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以俄為師”，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取得政權的；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儘管有我們自己的特色，毛澤東等幾代領導集體在探索中國走自己的路方面做出了鉅大努力，但基本原則、基本道路同蘇聯是一樣的：都是搞社會主義。蘇聯發生了向資本主義演變這樣的大事，當然會引發對我們已經走過的道路對不對、今後該往哪兒走這類問題的思考 and 討論。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看起來是在研究蘇聯問題，實際上是在回答中國問題。有的事情直接就中國說三道四，不大方便，借著蘇聯問題來發議論就好說一些。比如，除了敵對勢力外，對某些人來說，直接說中國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礙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不便公開說，於是他們就間接地用蘇聯來說事，猛批蘇聯的共產黨領導是“政治壟斷”、“專制”、“不民主”等等，因而導致蘇聯政局劇變，弦外之音，明眼人一聽就知道了：中國必須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否則早晚也會發生像蘇聯那樣的事件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借著歷史說現在，借著外國說中國，歷來如此，不過在當前蘇聯問題研究上更為明顯些。正因為蘇聯問題的研究，從根本上說，總是與中國前途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難怪各

個學科的學者都來研究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了。

正因為研究的結論涉及中國本身應該如何評價自己的革命歷史、應該朝什麼方向走，所以這種研究很大程度上就不僅僅是學術性的了，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性。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蘇聯演變問題上意見是那樣的對立，而且爭論又是那樣的激烈！

二

當前學術界關於蘇聯演變問題的分歧，大體上可以概括如下：

一個價值判斷，即從總體上說，蘇聯演變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就是“好得很”與“糟得很”之爭；

兩個焦點問題：一個是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叫“斯大林模式”），是基本否定，甚至“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還是“三七開”，成績是基本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另一個是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基本肯定，認為方向是對的，只是“搞晚了”，或者具體做法有毛病，還是完全否定，甚至加以譴責，認為方向不對，搞的是資本主義化改革，從而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個人物的評價：一個是對斯大林，是全盤否定，還是“三七開”；一個是對赫魯曉夫，是讚揚他為“改革家”，還是批評他是修正主義者，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奠了基；一個是對戈爾巴喬夫，是為他開脫、辯護，還是斥之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

一個落腳點：中國應該從蘇聯演變這一事件中吸取什麼教訓。這是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根本目的所在。不過有的文章對這一點往往語焉不詳，甚至不說，因為說出來有點不方便。這也是我們在某些研究蘇聯問題的文章中常見的一種手法。譬如，有人說，

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歷史的進步，那麼，中國是不是也應該這樣演變？那他就不往下說了，讓讀者自己去想、去得出結論了。

上述這幾個關鍵問題是有著內在聯繫的，作者在某個問題上持一種觀點，按照理論的邏輯，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他在另外幾個問題上的觀點。例如，有人主張徹底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斯大林模式”），他就必然是全盤否定斯大林，讚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而認為蘇聯演變是歷史的進步，最後必然得出理論：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錯了道路，應該趁早進行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改革。即使有時只對某個問題發表看法，只要作者邏輯清晰，那麼我們也可以推論出他在其他問題上的觀點。

三

關於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價值判斷，即是好還是壞，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說起來有點觸犯某些人的忌諱了，怎麼又講階級立場呢？不過事實是如此的。像蘇聯演變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判斷，這是必然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強大的國家，改旗易幟，短短六年時間就從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不講階級立場，能說得清楚嗎？顯然不能。

回顧一下 20 年前蘇聯劇變前後的情景吧。那時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無不歡欣鼓舞，彈冠相慶，甚至斷言，“歷史到此終結”，從此資本主義將重新一統天下，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作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是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兩者反映了無產階級同資

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根本利益。自從十月革命誕生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西方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就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根本任務。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指導下，自己就主動地向資本主義演變，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不費一兵一卒就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願望，豈不喜出望外！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一些學者跟在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後面，也表達出一種欣喜之情，宣佈蘇聯演變是歷史的進步，它使得蘇聯擺脫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縛”，澄清了“認識的迷誤”，回到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把社會主義搞垮了，他們倒高興了，這除了說明他們的確是站在同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一樣的立場上觀察和評價蘇聯演變這件事情外，還能怎麼解釋呢？

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對蘇聯演變問題，必然會做出截然相反的價值判斷。蘇聯東歐國家的演變使得世界政治地圖上一大片社會主義的紅色改變了顏色，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重新陷入被剝削、被壓迫的境地，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經濟滑坡、政局動蕩、治安惡化、生活下降，有的國家的經濟甚至至今還沒有恢復到動亂前的水平。原來的蘇聯東歐國家，不管有多大的失誤，搞的總還是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搞垮了，總不能說是好事吧。這一事件還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任何人可以制約它，美國可以在世界舞臺上為所欲為，20年時間就連續打了好幾次仗，像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等。想打誰就打誰，沒有理由就編個理由去打。所有這些，怎麼也不能說是好事吧。

我還聽到過一種意見：只要實現了民主、自由，總是進步的現象，不管花多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他們套用裴多菲的話說：“若為民主故，一切皆可拋”。他們是“民主迷”，把一人一票、

直接選舉，多黨制、輪流執政看作是民主與否的標準，認為這種制度具有“普世價值”，只要實行這樣的制度就是進步現象，就應該支持。按照這個邏輯，推翻了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了多黨制，當然是“歷史的進步”了。對這種說法，我們先從理論上講。民主、自由，作為一種觀念、一種價值，其內容是由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的，不同社會經濟關係就有不同的民主、自由。能把奴隸社會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等同起來嗎？顯然不能。世界上並沒有抽象的、“普世的”民主、自由，能夠存在的民主、自由總是具體的，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老實說，“普世價值”本身就是一個西方故意炮製出來的虛幻概念，也是他們設置的一個圈套：他們把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說成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價值，然後要求別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這個“普世價值”去進行制度設計，改造自己的社會制度。這就是那些人鼓吹“普世”民主、自由的目的。撇開這個理論問題不談，就說現實生活中的事吧。劇變後俄羅斯建立的民主制度，符合他們提出的標準：一人一票選舉總統，實行多黨制等等，然而這種“民主”卻實在難以令人恭維。我們舉一個例子吧。1993年10月，被西方譽為“俄羅斯民主之父”的葉利欽，當議會（最高蘇維埃）不大聽他的話，他提交的法令往往通不過的時候，他就調動軍隊，炮轟白宮（議會所在地），打死了150多人，宣佈解散議會，取消憲法，重新選舉。西方從來沒有指責他違反了民主原則，始終讚揚他是“民主的鬥士”。但是，這種“民主”，不要也罷。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找點具體材料來說事，那是很容易的。但我們要對一個事物做總體的價值判斷時，必須抓住它的基本性質。我們在對蘇聯演變這件事情做價值判斷時，不應糾纏具體問題，而要抓住問題的本質。

我們要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是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才符合歷史潮流。復辟資本主義雖然由於一段時間裡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時能得逞，但終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我們對一個歷史事件作價值判斷時，一定要看一看，它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總趨勢。這是最起碼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則。記得在抗日戰爭時，有人專門揭露抗日根據地的陰暗面，毛澤東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根據地工作中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首先要分清延安、西安。意思就是首先要分清事情的基本性質，看看它的總趨向，然後再講其他問題。我想，這一點，也應該是我們對蘇聯演變問題作價值判斷時的基本方法論原則。

四

如何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就是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叫“斯大林模式”），是這場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決定著其他問題的答案。如果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錯誤的、失敗的，應該否定，甚至說應該“否定得越徹底越好”，蘇聯演變的原因就在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即所謂“制度說”），演變的責任在斯大林身上（因為這個制度是在他領導下建立起來的），那麼，必然認為蘇聯演變是歷史的進步，它使得俄羅斯等國“走上了人類文明的正道”，同時必然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讚揚赫魯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如果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第二位的，總的評價是“三七開”，那麼，必然得出結論：應該在堅持它的正確方面的前提下進行改革，而不應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而戈爾巴喬夫的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是錯誤的，應該否定，赫魯

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也應該受到批判，蘇聯演變則是歷史的倒退。正因為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評價牽涉到一系列原則問題，所以，它成為爭論的焦點，是不足為奇的。

從 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算起，到 1985 年戈爾巴喬夫上臺（他上臺後，逐步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意味著蘇聯進入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有近 70 年的歷史。在這段時間裡，蘇聯經歷了許多事情，回過頭來看，他們做的事情，有對有錯，有值得讚揚的，也有應該批評的。歷史功過，任人評說。由於蘇聯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黨建等各個方面，因而誰都可以引用一些材料來對蘇聯問題發表議論，進而引伸出去，談論中國應該從蘇聯演變中吸取什麼教訓。這就是在蘇聯問題上眾說紛紜的一個原因。我們不來就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進行闡述，重要的是從總體上應該怎麼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有人抓住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犯的錯誤、體制上存在的弊病大做文章，他們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各個領域的問題說了個遍，羅列了一大堆。且不論其中有許多是誇大其詞，甚至是造謠誣衊（例如說肅反擴大化殺了五千萬人等等），即使是事實，能不能依據這些事實就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就需要作點分析。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想付諸實施的第一個試驗場。馬克思恩格斯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中推論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但它作為人類偉大的理想，怎麼在現實生活中付諸實施呢？在十月革命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短短的 72 天外，人們沒有實踐過。蘇聯是在沒有前人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想同本國國情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

設的。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既然是探索，就難免犯錯誤。正如列寧指出的：“在這樣嶄新、艱難和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怎樣對待這些錯誤呢？列寧強烈地批評了那種“對這些缺點採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人，說他們是“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人了”。² 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我們應該採取寬容的態度。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誤，不應苛求。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前進。因此，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

有人喜歡說“真相”，仿佛拋出一些別人不大知道的材料，就可以把人鎮住了。其實，列舉一些材料（即使那些材料是真實的），並不能說就說明了真相。對於一個複雜事物來說，只有透過現象揭示它的本質，才能說明它的真相。單純羅列事實，不抓住本質，好像是瞎子摸象，容易陷入片面性，反而把真相弄模糊了。列寧曾經說過，“社會生活現象極其複雜，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³ 因此他告誡我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

²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頁。

³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頁。

從事實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麼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⁴ 記得有我們黨一位領導同志談到“真實”時，也講過類似的意思。他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大意是：一個小夥子，長得相當英俊，但是有點禿腦袋。你給他照相，光照個禿腦袋，說他醜死了，儘管禿腦袋是事實，但不能說這反映了真實，這叫做“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只有正面照相，既看到腦袋脫髮，又看到全身，使人得出結論：這個人，總體上是英俊的，但有個禿頭的毛病，這才叫真實。這個例子，我一直記憶在心。生活的經歷使我慢慢悟出一個認識問題的方法：看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不能抓住一點材料就下結論，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全面分析，抓住本質，防止形而上學、片面性。

那麼，怎麼從總體上評價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呢？有兩個基本事實是不能迴避的。一個事實是，沙俄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1913年蘇聯疆域內的工業總產值只佔美國的6.9%，到1985年已達到美國的80%，從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而且蘇聯是在其國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惡劣環境下取得這一成就的。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那麼怎麼解釋這個事實呢？丘吉爾在紀念斯大林逝世時曾指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看他接手的時候，國家是什麼樣子，而他離開的時候，國家又是什麼樣子。斯大林接手的時候蘇聯是馬拉犁耕地的落後國家，而他離開的時候蘇聯是擁有原子彈的強國。大家知道，丘吉爾是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另一個事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⁴ 《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頁。

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軍事、經濟實力進攻蘇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蘇聯憑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依靠廣大勞動人民和紅軍戰士戰勝了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如果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按照某些人的說法，國內人民怨聲載道，矛盾重重，那麼在希特勒瘋進攻面前，蘇聯怎麼能頂得住並取得勝利呢？

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毛澤東是辯證唯物主義分析的典範，他的分析方法以及得出的結論，值得我們學習和認真思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第一個指出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需要做具體分析，不能盲目照搬。他在世界社會主義各國紛紛照搬蘇聯模式的環境下，強調必須以蘇聯為鑒戒，結合中國國情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論十大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由此發軔的。然而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又是他站出來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強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績是基本的，不能否定。1956年8月底，毛澤東明確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麼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東西有20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後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

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⁵ 從實際出發，全面地進行分析，同時分清主流和支流，這是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的方法。

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聽起來那麼耳熟。老實說，自從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就是這樣咒罵的。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實際上就是給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抹黑，因為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列寧就由於身體原因，不久就病逝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罵倒了斯大林，也就罵倒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戈爾巴喬夫繼承了赫魯曉夫的衣鉢，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直截了當地斷言：“斯大林模式遭到了戰略性失敗”，進而要求“徹底拋棄斯大林主義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由此走上資本主義化道路。可以說，從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到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沒有一個不是咒罵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一個不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的。國內發表這樣的意見的人實際上不過是拾他們的牙慧罷了。

五

經常有人說，蘇聯演變是因為他們所建立的制度不對，應該拋棄這種制度，它早晚要變，而且越早變越好。這就是著名的演變原因的“制度說”。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從社會制度角度看，怎麼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要有正確的方法。1956年我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時，在毛澤東主持下

⁵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頁。

撰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檢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在分析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時，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具體制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分開進行評價。過了半個世紀，回過頭來看，這個分析方法十分正確，也十分重要，它可以對一種社會制度做出科學的判斷。社會制度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社會基本制度，一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前者是決定性的，它反映了社會的本質特徵，後者是前者的具體實現形式，是由前者決定的。我們應該就這兩個層次分別進行分析，然後綜合起來進行評價，而不要籠統地談論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模式。

蘇聯建立了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特徵的經濟制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這些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它們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原則。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它“放之四海而皆準”，是任何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必須堅持的。拋棄了這些基本制度，就不成為社會主義了，就變成別的什麼社會制度了。

這種基本制度不是出於人們的主觀想像，不是哪個人主觀設計出來的，而是由社會發展的規律客觀地決定的。我們研究一下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邏輯，就可以明白這一點。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社會主義時，並不是訴諸道德和法，他們認為，從道義上對資本主義的剝削表示憤怒，由此出發設計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多麼入情入理，我們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徵。他們提出的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存

在的矛盾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加深、經濟聯繫的密切化，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佔有生產資料並調節整個國民經濟。但是，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私有制妨礙了生產力性質的這種客觀要求的實現，因而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就成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必須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然而建立公有制，“剝奪剝奪者”，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經濟基礎，就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無產階級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做到。可見，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物，它的本質特徵必然是：政治上，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它的政黨處於領導地位，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居於指導地位。用我們常用的說法，就是四項基本原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有關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內容，正是體現了這些原則。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具體制度，即具體的政治經濟體制、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是蘇聯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與蘇聯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這一類制度是在探索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對這些具體制度必須進行具體分析。蘇聯建立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有幾種不同的情況：有的是正確的，別的國家可以學習和借鑒；有的是錯誤的，必須拋棄；

有的在蘇聯條件下是對的，但不能照搬到別的國家去；更多的情況是，有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隨著條件的變化卻必須進行改革。

把兩個層次的內容綜合起來，我們該怎樣評價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是基本制度的實現形式，是第二位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內容是正確的，不能否定，它是不同社會主義模式的共同的東西，只要搞社會主義，就應該堅持，拋棄了就不叫社會主義了；有關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的內容則是有對有錯，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們不能照搬，而應該把它作為借鑒，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兩方面的內容綜合起來，應該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從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確的，局部是錯誤的。儘管列舉起來弊病甚多，但從整體上看，應該說是“三七開”，不能說是失敗的。

國內學者從制度上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時候，是不區分這兩個層次的。他們有時講具體體制方面的問題，聽起來頗有道理，因為在這一層次蘇聯模式的確存在不少弊病，需要改革，但他們突出反對的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他們攻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我看到一篇長文，詳細批判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心思想是，蘇聯存在“三壟斷”，即政治上共產黨“一黨專政”，不允許其他政黨的競爭，是“政治壟斷”，從而導致人與政權、與政治的異化；經濟上公有制佔統治地位，排斥了對所有制的自由選擇，造成“經濟壟斷”，導致人與生產資料、財產的異化；思想上馬克思為主義居於指導地位，妨礙吸收先進的思想文化，造成“精神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於是他得出結論：拋棄這樣的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消

除了壟斷，克服了異化，當然是歷史的進步了。這套“理論”聽起來振振有詞，然而並不是作者的發明，戈爾巴喬夫在20多年前就講過了，而且他是把這個“三壟斷”作為論證改革的必要性的論據的。作者提出“三壟斷”一點新意都沒有，甚至連用詞都與戈爾巴喬夫一樣。

“三壟斷”的批判矛頭直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社會主義必須由工人階級（通過自己的政黨——共產黨）掌握政權，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總不能搞社會主義吧？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只有公有制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總不能搞社會主義吧？社會主義必須把工人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用馬克思主義來引領社會思潮，實行實質上是讓資產階級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所謂指導思想多元化，總不能搞社會主義吧？可見，批判所謂的“三壟斷”，實際上就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原則，其目的就是要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看一看戈爾巴喬夫所幹的事吧，他正是從批判“三壟斷”著手，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逐一予以否定，然後通過改革把社會主義制度復辟成資本主義制度的。

所以，從理論上講，關於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爭論，撇開那些細枝末節、無關緊要的爭論，歸結起來，其實質是關於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是否正確的爭論，也是人類是不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爭論。有的學者想通過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來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進而要求中國的改革也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確定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原則，走另外一條道路，

也許這就是他們起勁地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動因。當然，最後的目的，有的學者不願直接說出來，但實質是如此的。

六

還有必要研究一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現在，國內的學者完全贊成、讚揚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人不多了，因為他的改革使俄羅斯以及其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國家紛紛陷入嚴重的困境。但是，為他的改革開脫的人卻為數不少。例如，有人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大方向是對的，只是具體做法有毛病，他把改革的循序搞錯了，應該先搞農業改革，然後搞工業改革；應該先搞經濟改革，然後搞政治改革，仿佛只要把改革的循序搞對了，改革是能夠成功的；有人說，應該集中力量搞改革，不該節外生枝，搞什麼加速戰略、反酗酒運動等等；有人說，蘇聯解體、俄羅斯等國搞成今天這個樣子，不能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是斯大林模式必然造成的，即使不搞改革，也會出現這樣的甚至更壞的結果，責任在斯大林身上。如此等等。對於這些強詞奪理的說法，我們不值得一一反駁。我們只想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性質、方向作一點分析。

戈爾巴喬夫一上臺，就突出地強調改革，他在各種會議上，言必稱改革，儼然以改革家自居。蘇聯人民曾對他的改革抱有極大的希望，全世界的人也密切注視著他的改革會把蘇聯帶到哪兒去。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評價，可以說也代表了對他本人的評價。

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要求，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理論上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才會從根本上否定改革。蘇聯歷史上一度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到了 20 世紀 80 年

代，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提出改革，改革成為時髦的話題。這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改什麼，朝哪兒改，要改成什麼樣子，也就是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是什麼。

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存在兩種改革觀，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觀，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中不適合生產發展要求的那些部分，上層建築中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那些部分。這種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觀，即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通過改革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回顧一下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沒有哪一個國家不存在這兩種改革觀的鬥爭的，而這種鬥爭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和走向。有的學者極力否認兩種改革觀的存在，認為“改革就是改革，哪有什麼兩種改革觀？提出兩種改革觀就是反對改革”。這就設置了一個陷阱：他們自己設計了一套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方案，你要是不贊成，你就是反對改革。顯然誰也不願、也不能反對改革。他們想用一頂“反對改革”的帽子，壓你跟著他們的改革方案走。然而兩種改革觀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是靠扣一頂帽子就能否定了的。我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典型，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的典型。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革使得兩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一事實，誰能否定得了？

兩種改革觀分歧的核心是改革的對象，即改什麼。這裡的關鍵是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還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作為改革的對象，也就是說，要不要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撇開政治目的不說，僅僅從理論上講，這種分歧的根源是如

何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

改革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從經濟上說，改革是調整生產關係，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⁶ 換句話說，就是要解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科學地回答“改什麼”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狀態，明確什麼東西是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毛澤東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的任務。所以，只有改革才能發展社會主義。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是處於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基本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局部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

⁶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頁。

非基本部分。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也一樣），使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改革，而要把“變”與“不變”統一起來，在確定改革的對象的同時，也要明確在改革過程中哪些東西是應該堅持、不能動搖的，既講“改什麼”，也講“不改什麼”。

那些主張資本主義化改革的人，在理論上有一種片面性，即只看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同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一面，改革它，可以解放、發展生產力，而看不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本部分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必須堅持，堅持它，也是解放、發展生產力。只講改革，不講堅持，仿佛什麼都要改革，只要是改革就是正確的，都應該贊成，仿佛什麼都不能堅持，只要是堅持就是錯誤的，都應該批判。一切“改革派”都應支持，而不管他們改革什麼；一切“保守派”都要反對，不管他們保守什麼。這種不作具體分析的簡單化、片面性的邏輯，的確誤導了一些同志，模糊了改革的方向和性質。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回顧一下 20 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的改革吧！那時他口口聲聲講改革，但從來不肯明確改革的對象，即改什麼，同時卻在厲聲批判什麼“社會主義守靈人”。戈爾巴喬夫製造了一種氛圍：誰否定社會主義實踐、否定黨的歷史，他就是“改革派”，就應該肯定和支持，而且否定得越徹底，甚至是破口大罵，他越是得到讚揚。一時間，“告別過去”，“炸毀一切：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等等“改革”口號甚囂塵上。這似乎是最徹底的改革了，然而正是這種否定一切的改革，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復辟。當這種“徹底改革”的惡果顯示出來，俄羅斯人民痛心地覺悟到“上了政治騙子、理論騙子的當”的時候，卻

已為時過晚，難以挽回了。俄羅斯的現實說明，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否認改革與堅持統一的必要性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進一步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哪些部分是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應該堅持，哪些部分是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相矛盾，必須改革。鄧小平全面地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上述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鄧小平在談到我國改革的偉大意義時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⁷ 這裡，鄧小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應該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嚴格區分開來。這就在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過程中，明確了堅持與改革的對象：對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必須堅持；對於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們必須改革。改革不是否定和取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是統一的。

可見，從理論上講，兩種改革觀的分歧根源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狀況的判斷，進而是對改革對象的判斷。我們再來看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實踐吧。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前提是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因而改革的重點是針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的。他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改革的內容，主要是：

第一，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主張實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認為堅持共產黨領導就是主張搞與“民治國家”相對立的“黨治國家”，違反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認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和

⁷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

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黨的領導看作是“官僚專制”、“行政命令”，因而反對共產黨“對政權的霸佔”，要求放棄黨的“政治壟斷”，取消憲法中有關共產黨領導的條款，使共產黨成為與各種政治勢力（包括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進行所謂平等競爭、爭取政治權力的政治組織。他鼓吹實行多黨制，強調黨不謀求壟斷，允許“表達各種政治意願”的“各種政治組織和派別自由競爭”，共產黨應在這一競爭中“謀求得到一個被承認的席位”。然而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讓資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還能搞社會主義嗎？我們黨對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當蘇聯共產黨 1990 年二月全會決定實行多黨制的時候，我們黨就明確指出，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全民國家”。戈爾巴喬夫把剝奪階級敵人民主、自由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使人與政權、與政治相分離”的根源，是“專制”、“獨裁”。他藉口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犯過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違反人道主義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何階級的專政”，要求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戈爾巴喬夫宣稱：“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議和意見，即我們需要專政，只有某種專政才能拯救我們。”他讚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理論。他提出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全面充實人權”，使之符合“全民國家”的結論。大家知道，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它總是具有階級性的，不是這個階級的專政，就是那個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可靠保障。世界上並沒有全民民主的國家，只要是國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當今條件下，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恢復資產階級專政。

第三，否定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張私有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宣佈：“共產黨人可以

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⁸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的基本特徵。戈爾巴喬夫完全否定這一最基本的原則，攻擊公有制佔統治地位是“經濟壟斷”，妨礙人們自由地選擇所有制形式，妨礙人的價值的實現，因而要求把已實現了公有化的經濟實行私有化。他藉口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方面存在缺陷，在“取消國家所有制的壟斷”的口號下，主張把國營企業的財產分散歸個人所有。他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與生產資料的異化”，“恢復社會公正”，“實現個人利益”，“保證社會安定”。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必然導致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為資本主義制度奠定經濟基礎。

第四，否認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戈爾巴喬夫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就是“精神壟斷”，妨礙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必須“拋棄對不同觀點和思想的意識形態限制，教條主義和不容忍態度”。他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認為社會需要各種意識形態“自由競爭”，“堅決反對對輿論工具進行任何形式的霸佔，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對輿論工具進行壟斷”，允許各個黨派、各種政治組織利用電視、廣播、報刊自由地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大家知道，任何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都是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思想起指導作用，它引領社會各種思潮按照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向發展。一個社會，指導思想只能有一個，在當今社會的意識形態陣地，馬克思主義不去佔領，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去佔領，多元化的指導思想只是一種空想。

這種改革，推翻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的典型。這種改革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

⁸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5頁。

要。難怪撒切爾夫人稱戈爾巴喬夫為自己人，說“借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也難怪西方要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並建議英國女王授予他榮譽爵士的稱號。他幹了西方想幹而又多年來一直幹不成的事：消滅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一點也不為過。因此，我們決不能東拉西扯地編點“理由”來為他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某些學者、特別是那些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反對“三壟斷”的學者的改革主張，都可以從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實踐中找到影子，甚至用詞都是一樣的。這種改革的後果是眾所周知的了。我們應該從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中吸取教訓，劃清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的界限，決不允許我國走蘇聯改革的道路，步蘇聯演變悲慘結局的後塵。這是一條最重要的、必須切記的教訓。